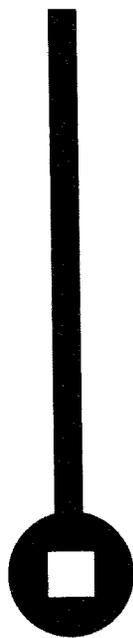


杨华山 著

晚清厘金与中国早期现代化建设



人民出版社



晚清厘金
与中国早期现代化建设

杨华山 著

责任编辑:马长虹
装帧设计:雅思雅特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晚清厘金与中国早期现代化建设/杨华山 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11

ISBN 978-7-01-009874-6

I. ①晚… II. ①杨… III. ①厘金制度-经济史-研究-中国-清后期
IV. ①F812.9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77990 号

晚清厘金与中国早期现代化建设

WANQING LIJIN YU ZHONGGUO ZAOQI XIANDAIHUA JIANSHE

杨华山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北京集惠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1 年 11 月第 1 版 2011 年 1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16

字数:250 千字 印数:0,001-3,000 册

ISBN 978-7-01-009874-6 定价:38.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序

杨华山教授在其博士论文基础上经多年增补、修改而撰成的专著《晚清厘金与中国早期现代化建设》即将付梓出版了，在祝贺之余，作为他曾经的“导师”，我觉得实有必要写几句话，向广大读者作一简要推介。

厘金问题，是中国近代历史研究的一个老课题，研究成果亦不在少数，尤其罗玉东先生的《中国厘金史》在此领域的研究中，可谓最为详备，不仅考察了厘金制度的源流、演变，而且分述了各省厘金征收及支出的详细情况，尤其依据大量第一手资料胪列出的详细统计数据及大量表格，更使后人望尘莫及，必须在研究中大量引用，高度重视。

但是，类似厘金这样的前人研究较多的“老问题”，是否就没有进一步研究的价值了呢？答案是否定的。历史是丰富多样、千姿百态的，任何前人的研究都会留有不足和遗憾，不可能穷尽一切资料和问题，这就为后续的研究提供了空间和可能。诚如杨著的分析，罗玉东先生的大著虽然资料详备，条分缕析，但在理论分析和深度上似还留有缺陷，另因主要只写到晚清，所以基本上是一本晚清厘金史。而其他学者的论著也多是从事政史的角度研究厘金问题，远未解决厘金制度所包含的所有问题。

“老问题”还是可以实现新突破的。而要在“老问题”上做出创新性的研究，最根本的有两点：要么有新的材料予以补充，要么有从新的视角进行阐发，得出与前人不同的新结论，由此方能体现学术的进

■ 晚清厘金与中国早期现代化建设

步。杨著虽然在材料上依据新近出版的商会档案等有所补充,但更主要是从新的视角出发,提出了若干新的问题和见解,我以为这是杨著的主要学术贡献。

通常认为,“厘金”是晚清的一项“苛政”,早该予以革除,所谓:“厘税之苛虐,关卡之刁难,实商人切肤之痛耳”。但这项“苛政”为何从1853年(咸丰三年)开征,到1930年底废除,前后竟延续了77年之久!其间虽“裁厘”之声不绝,方案层出不穷,但厘金制度却依然故我,尤其在北洋军阀混战时期,甚至变本加厉,愈演愈烈。对个中奥秘,杨著独树一帜,以现代化过程中一柄犀利的“双刃剑”的理论解之。

杨著认为,厘金虽然是因应清政府镇压太平军起义的临时筹饷举措,但旋即作为洋务运动的资金来源之一而大力举办,无论是在中央财政还是地方政府支出,厘金都参与了早期现代化的建设,成为早期现代化资本原始积累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这一意义而言,厘金的产生有其一定的必然性和合理性。“以往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对厘金弊害的揭露与抨击,没有从厘金于资本积累的积极功用上作深入研究。”

我不敢保证杨著的见解就一定正确,但他至少提出了一种新思路,使我们能更深入地思考为什么厘金在不断的“裁废”声浪中能如此长久的存在。这是否真与中国近代不同于西方的“资本原始积累”方式有关?其实,在中国近代特殊的历史环境下,许多西方认为合理的、理性的制度,必须经过“变异”之后方能移植于中国,不“合理”但却“合情”的现象,在近代中国可谓屡见不鲜。如过去我们就曾注意到,在近代企业制度史研究中,一些非常“西化”、“现代化”的企业(如穆藕初按西方科学管理方法经营的棉纺织企业),其实际经营业绩和后劲,有时反倒不如不那么“西化”和“现代化”的家族式企业(如著名的荣氏兄弟企业)。这是否意味着,在中国本身就不那么现代化的环境之中,未臻充分现代化的形式,即“不完全的西化”,可能反倒是最适用的形式。这也提醒我们,在制度变迁史研究中,有时非理性的制度往往能“合情”地存在,“存在的即是合理的”。对厘金制度,作为研究者,我们与其跟着去谴责它的种种不合理和遗害无穷,不如更客观、

理性地分析它之所以能长时期存在的各种理由和社会环境。在这方面，杨著同样给我们诸多的启示。

我另外想说的一点，是在治学态度的严谨上，杨著同样可以给一些更年轻的学者以启示。我们常说“十年磨一剑”，一本学术专著的写成到出版应当有一个适当长的周期，以便对自己的学术成果进行反复的提炼与思考，最终奉献给读者成熟的学术精品。我也时常劝一些博士学位获得者，要对自己的博士论文花费较长的时间进行反复的推敲、补充和修改，然后再拿去出版。学问是慢功出细活，千万不要以一种“只争朝夕”的态度，“赶”字当头，急匆匆地写，急匆匆地出，否则会留下许多无法弥补的学术遗憾。这些话，华山至少是听进去了，从他2000年博士毕业至今，已整整过去了11个年头，期间经过反反复复的修改和不断进行补充，才有了今天这本专著。相比起他当初的博士论文，眼下这本专著已显然成熟许多，避免了很多“硬伤”。我还是相信那句话：“流水不争先”，只要是金子总会发光。“文如其人”、“学如其人”，做学问与做人之间存在一致性，只有做好了人，才能真正做好学问，治学始自做人。让我们常以此共勉吧！

马 敏

2011年6月3日于新迁之“淡泊斋”

导论 / 1

第一章 早期现代化启动时的资本状况 / 11

- 一、“盛世”的衰落 / 11
- 二、民间资本概貌 / 28
- 三、置地买官：投资理念的误区 / 35
- 四、专利与官利：诱力与阻力 / 42

第二章 厘金与晚清资本原始积累 / 54

- 一、清朝前期的财政状况 / 54
- 二、厘金的产生及其“中兴”之功 / 62
- 三、资本原始积累的重要构成 / 69
- 四、个案分析：厘金与湖北早期现代化建设 / 87
- 五、厘金与内外债 / 96

第三章 “裁厘加税”的谈判与失败 / 106

- 一、“裁厘加税”的提出 / 106
- 二、“裁厘加税”的早期交涉 / 113
- 三、《辛丑条约》后“裁厘加税”谈判的曲折过程 / 117

● 晚清厘金与中国早期现代化建设

四、二难选择的困境 / 123

第四章 “裁厘统捐”与“裁厘认捐”的尝试
及夭折 / 131

一、厘金之非 / 131

二、官方的“裁厘统捐” / 142

三、厘金与印花税 / 148

四、商民的“裁厘认捐” / 157

五、夭折原因分析 / 160

第五章 从厘金看中外资本原始积累的
异同 / 170

一、中英比较 / 170

二、中日比较 / 182

三、资本原始积累的一般规律 / 192

四、晚清路径的失误 / 202

余论：成败之间——裁厘加税的最终完成与
早期现代化的命运 / 220

参考文献举要 / 233

后记 / 246

导论

一、选题旨趣

按照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现代资本主义大工业的产生首先必须具备两个不可缺少的基本条件,其一是资本原始积累的完成,大量货币财富在少数人手中积累,他们有可能和条件进行大规模的资本主义工业投资和生产。其二是失去生产资料的自由劳动者的普遍出现,他们虽有人身自由,但由于没有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为了生存被迫受雇于资本家,出卖自己仅有的劳动力。没有资本的原始积累,就不可能有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发展和壮大。“资本积累以剩余价值为前提,剩余价值以资本主义生产为前提,而资本主义生产又以商品生产者握有较大量的资本和劳动力为前提。因此,这整个运动好像是在一个恶性循环中兜圈子,要脱出这个循环,就只有假定在资本主义积累之前有一种‘原始’积累(亚当·斯密称为‘预先积累’),这种积累不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结果,而是它的起点。”^①

无论是内源型(或曰“内生型”、“源发型”等)现代化国家,还是外源型(或曰“外生型”、“后发型”等)现代化国家,就资本主义大工业的产生而言,以上两个条件具有相对普遍的指导意义。一般来说,外源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60页。

● 晚清厘金与中国早期现代化建设

型现代化国家都是被动地蹒跚于现代化的轨道上,中国可谓典型之一。作为一个有着悠久历史文化传统的农业宗法社会,中国以农立国,烂熟的小农自然经济,特有的生育文化的影响,清朝初期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故自大清帝国中期以来,中国人口压力严重,人地矛盾愈演愈烈,致使许多人或者流亡各地,形成流民、棚民;或者海外谋生,漂流南洋。这预示着中国蕴涵着成本低廉、潜力巨大的劳动力市场,在一定条件下,这一潜在的市场很容易凸显为现实的市场。因此,在中国早期现代化启动时期,几乎从未形成过雇佣工人的卖方市场,这从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不得不背井离乡远赴外洋以及苦力贸易的繁荣等亦可得到说明。史载福建、广东“人稠地狭,田园不足于耕,望海谋生,十居五、六”^①。苦力贸易兴起后,被西方殖民者掠贩到美洲等地的华工苦力迅速增加。19世纪上半期出国华工为32万人;1850年到1875年猛增到128万人,其中前往美洲的为53.5万人。此后由于美国的经济危机而掀起的排华运动使到美华工减少,1876年到1900年出国华工总数降至75万人,其中去美洲的仅为2.1万人。^②从18世纪至20世纪30年代的两个世纪里以各种形式出国的华工大约有1000万人,世界各地几乎都能看到勤劳而不幸的华工的身影。^③

但非常不幸的是,中国的资本原始积累则完全是另一个极端。在整个近代历史时期,中国的现代化建设的资本原始积累始终没有完成,这是中国现代化未能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中国早期现代化失败的原因非常复杂,学术界分别从不同角度有所论述,但纯从资本原始积累这一侧面着眼,仍有值得深入检讨之处。

厘金的创设带有一定的偶然性。它本是为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运

^① 蓝鼎元:《论南洋事宜书》。贺长龄辑:《皇朝经世文编》卷八三,兵政十四,海防上,页十三。

^② 彭家礼:《十九世纪西方侵略者对中国劳工的掳掠》。载《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集刊》第一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

^③ 也有学者认为,1840—1949年间中国外迁移民总数大约在1500万左右,平均每年的外迁人口为15万人。见葛剑雄主编:《中国移民史》第六卷,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531页。

动筹募军饷的临时性捐税,但事平以后不仅未遵行裁撤的许诺,反而更加普及和苛烦。从时人到今天的学术界对这一长久性的“临时”恶税的危害倍加诟病与讨伐。学术界对厘金的研究大体上仅限于对这一恶税的抨击上。然而,厘金从晚清一直延续到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前后累计达近80年之久,即使晚清政府,也未尝不知道厘金的种种祸国病民的弊窦,但却未能断然裁撤,这其中肯定有其相对的必然性和合理性,否则也绝对不会存留历经如此之久。如何将厘金与晚清现代化建设初期的资本原始积累结合起来探讨,史学界尚无具体研究。本书选择厘金为主要探讨对象,试图由此透视厘金与晚清资本原始积累及早期现代化建设之间、裁厘与加税之间、裁厘与统捐认捐之间的互动关系,这是一个颇富意义的选题。仅以厘金而论,围绕其整顿、减降、转换与裁撤,这不仅是近代经济史、财政史、税制税收史的重要研究内容,而且因为厘金“是前四十年(指新商约谈判前)许多国际摩擦的因素”^①,因此它也是近代政治史以至于外交史上的焦点之一,有待进一步探讨的地方颇多。

二、“现代化”含义的界定

“近代”与“现代”在英语中是同一个词,即 modern;同理,“近代化”与“现代化”在英语中亦为同一个词,即 modernization。由于在汉语中没有一个十分准确的语词与之对应,故学术界在使用它时曾经比较混乱,尽管现在学术界比较一致地倾向于译为“现代化”,而较少使用“近代化”,但仍有相当部分学者沿用“近代化”。有学者认为,“近代化与现代化是一个有联系又不完全相同的概念”,并将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过渡称为“近代化”,而将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发展称之为中国“现代化”。这种区分貌似有一定道理。但是,如果把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称为“现代化”,那么西方发达的

^① 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三卷,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第396页。

资本主义国家似乎不能称为“现代化”，因为尽管社会主义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而从目前形势看，他们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还很难向社会主义过渡。但是他们不仅早就实现了现代化，而且正在或已经进入“后现代”、“后工业”社会。对比之下，我国的现代化是一个迄今尚未完成的艰巨任务。因此，以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作为划分“近代化”与“现代化”的标准是不够缜密的。其实，既然“近代化”与“现代化”是由于日文和中文翻译时人为制造出来的歧义，不如还其英文中的本来面目；“近代化”也好，“现代化”也好，既然源于西方，仍应按照其本意来使用。为了分别 1949 年前后不同性质的现代化，不妨将前者称为“早期现代化，把后者称为现代化”^①。本书探讨的时限是晚清时期，即是从这一意义上使用“现代化”。

有人认为，中国较早明确提出“现代化”问题的是胡适。胡适于 1929 年为《中国基督教年鉴》用英文写了一篇《文化的冲突》，文中提出中国应“一心一意”地接受现代化。^②“现代化”一词在报刊上的广泛流行大约肇始于 1933 年。是年 7 月《申报月刊》为创刊周年纪念，发行特大号，刊出“中国现代化问题号”特辑，共收到 10 篇短论和 16 篇专论，反映了当时知识界对中国“现代化”的理解和思考。^③

建国后学习苏联的经验，照搬老大哥的范式。上世纪 50 年代提出的目标是实现工业化，即“变落后的农业国为先进的工业国”。1964 年毛泽东审阅周恩来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草稿时加写了一段文字，其中有一句话说“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④这大约是建国后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现代化”之嚆矢。周恩来根据这一思想，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正式提出了著名的“四个现代化”（即农业、工业、

^① 章开沅、罗福惠主编：《比较中的审视：中国早期现代化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29 页。

^② 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 11 册，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169 页。

^③ 见罗荣渠：《中国近百年来现代化思潮演变的反思》。罗荣渠主编：《从“西化”到现代化——五四以来有关中国的文化趋向和发展道路论争文选》，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0 年版。

^④ 《毛泽东文集》第八卷，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341 页。

科学技术和国防现代化)概念。但毛泽东用“大跃进”进而以“阶级斗争”、“文化大革命”的运作方式,最终与“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背道而驰,成为现代化的反动。

现代化的含义更是丰富多彩。总体来说,中外学术界越来越普遍地认为现代化是一个整体和系统,绝不止是简单的工业化。如布罗代尔说:现代化“是比工业化范围更广的一个整体运动”^①。亨廷顿认为:“现代化是一个多层面的进程,它涉及到人类思想和行为所有领域里的变革。”^②章开沅先生在《比较中的审视:中国早期现代化研究》一书的“序”中也说:“现代化不等同于‘西化’,也不是简单的‘工业化+民主化’,它是一个完整的社会变革系统工程。”^③有的学者强调现代化是一个变革的过程,“现代化是人类历史上最剧烈、最深远并且显然是无可避免的一场社会变革”,它是“各社会在技术革命的冲击下,业已经历或正在进行的转变过程”^④。这一转变过程不是单向的,而是涉及社会各个层面。

相对来说,我们过去频繁使用的“四个现代化”实际上是有意或无意地对现代化的片面和简单的理解,因为它至少没有包容政治、文化、教育的现代化,尤其是它漠视作为主体的人的现代化,使“四个现代化”最终只能成为苍白乏力的政治宣传口号。既往的历史和演进的现实已经充分诠释了人的现代化的极端重要性。如果一个国家的民众缺乏一种能赋予现代制度“以真实生命力的广泛的现代心理基础,如果执行和运用着这些现代制度的人,自身还没有从心理、思想、态度和行为方式上都经历一个向现代化的转变,失败和畸形发展的悲剧结局是不可避免的。再完美的现代制度和管理方式,再先进的技术工艺,也会在一群传统人的手中变成废纸一堆”^⑤。以此来评述中国现代化之路错乱曲折的原因不可不谓颇中肯綮。也许正因为如

① 费尔南·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三卷,三联书店1993年版,第682页。

② 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30页。

③ 章开沅、罗福惠主编:《比较中的审视:中国早期现代化研究》,“序言”。

④ 罗兹曼主编:《中国的现代化》,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4页。

⑤ 阿历克斯·英格尔斯等:《人的现代化》,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页。

此,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四个现代化”的使用频率渐少,实现“四化”的目标被代之以“高度民主、文明、富强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1987年中共十三大提出的目标是“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这无疑比“四个现代化”的化约更趋合理和完整。现代化的整体含义决定了现代化建设任务的多样性。

总体上看,现代化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后者主要是指经济和科技的现代化,前者则不仅包括生产力的现代化,而且包括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现代化,即整个社会生活各方面的现代化和人的现代化。历史愈往前发展,愈应从广义上理解现代化。对晚清的现代化建设问题,本书没有必要、也不可能面面俱到,这里仅撷取晚清早期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的两项内容,即国防建设和举办现代工商业。前者包括兴办军事工业及新式陆海军建设。大清帝国被逼打开国门之时,就面临着被沦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危险,如果没有起码的国防能力,国家的独立尚不能保,则毋庸奢谈其他现代化建设;何况,军事工业不仅是中国早期现代化启动之龙头,也是其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基于此点考虑,本书将晚清的国防建设亦纳于讨论的范围之内。至于工业化,则是现代化的核心内容,当然更在探讨之列。

资本的原始积累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起点,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就是现代化启动的起点。没有资本原始积累,就不可能有现代化的发生;资本原始积累不充分,现代化也不可能完成。资本原始积累虽然是现代化建设不可或缺的前提条件和基础,但资本原始积累的完成并不等于现代化的实现,原因很简单,现代化是一个完整系统的社会变革工程。本书主要不是讨论现代化建设本身,而是以厘金为中心,讨论晚清早期现代化启动阶段的资本原始积累问题。

三、研究现状及学术背景

研究中国的现代化问题国外比国内起步要早。罗兹曼主编的

《中国的现代化》是西方,尤其是美国学者研究中国现代化历史与问题的最系统的代表作。该书自鸦片战争,下沿1980年,从国际关系、政治结构、经济结构与经济增长、社会整合以及知识与教育等五个大的方面探讨了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过程,这正体现了该书作者们的现代化观,即现代化是一个涉及社会各层面的激烈变革的过程。在国内,自上世纪80年代学术界掀起了“现代化”研究热,迄今未见冷却的迹象。历史学、经济学、哲学、社会学、政治学以至于文学界纷纷厕身其中,取得了大量成果。在史学界,章开沅、罗福惠主编的《比较中的审视:中国早期现代化研究》以及罗荣渠主编的“世界现代化进程研究丛书”(尤其是罗荣渠亲自著作的《现代化新论》和《现代化新论续编》^①二书)即极为引人注目,这些无疑是本书的重要理论基础及出发点。

关于厘金问题,罗玉东的《中国厘金史》^②最为完备。该书考察了厘金制度源流、演变史,不仅叙述了全国,而且还分述了各省的厘金的征收及支出的较详备情况。该书的不足之处是缺乏理论分析和深度,但它依据当时的第一手资料,胪列出详细的统计数据,制作了大量的分类表格,诚为该书的最大长处和特色,非常便于检索和再利用。这为本书进行理论分析提供了较便利的量化基础。另外,该书实际上只写到清末,故书名应为《晚清厘金史》而不应是《中国厘金史》。台湾学者何烈著《厘金制度新探》^③主要探讨厘金制度在清末财政上的地位,及其在不同的时代中对于各方而引起的不同影响,借以确定厘金制度在中国近代史上扮演的角色。近人新作郑备军的《中国近代厘金制度研究》^④在前人成果的基础上,从税费改革的角度研究厘金。无论何著还是郑著,主要从财政的角度研究厘金,远未解决厘金制度的所有问题。

① 罗荣渠:《现代化新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现代化新论续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② 罗玉东:《中国厘金史》,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

③ 何烈:《厘金制度新探》,台湾东吴大学出版1972年版。

④ 郑备军:《中国近代厘金制度研究》,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4年版。

关于资本原始积累,虞和平在《比较中的审视:中国早期现代化研究》一书中略有陈述,但其范围是整个近代时期(1840—1949),时间跨度虽大,而内容较为简略,单纯探讨晚清资本原始积累的内容极少。

关于“裁厘加税”。由于裁厘加税在晚清主要只是一个提议,虽然《辛丑条约》后英、美、日等国与清政府举行的新商约谈判中的核心内容之一就是“裁厘加税”,虽然也订立了条约,但因种种复杂因素的制约,有关“裁厘加税”的条款并未执行,因此史学界对此问题缺乏研究。丁名楠等著《帝国主义侵华史》第二卷^①第三章的第一节“中英、中美、中日等新商约的签订”记述了新商约谈判的简略过程,其中对“裁厘加税”问题当然有所叙述。徐鼎新曾写过一篇短文简要介绍了中英“商约”谈判^②,周育民的《晚清厘金、子口税与加税免厘》^③探讨了厘金、子口税与加税免厘之间的关系。此外更全面、更深入的研究尚不多见。晚清为了给“裁厘加税”做准备,对厘金着手整顿,试图改厘金为统捐。虽然史学界对“裁厘统捐”研究不够,但对以江苏商民为代表掀起的“裁厘认捐”活动的研究有多篇论文,如马敏、王翔、张海林以及韩国学者申义植等都或多或少的涉及到该问题,这些将在下文的“裁厘认捐”部分的注释中说明。对“裁厘统捐”与“裁厘认捐”的比较及与之相关的印花税等问题仍有探讨的必要。

近时财政部科研所的“中国近代厘金研究”课题组对厘金问题也进行了研究。该课题组主要是从税费改革的角度研究厘金,认为“目前,税费改革是我国财税改革中的重头戏,而研究清末民初的‘厘金’对这一工作的圆满成功会有不少有益的启示”。在《清末财政状况恶化对社会的影响》^④一文,他们认为“乱收费”、“乱摊派”式的厘金主要是在中央财政日益恶化、地方擅自筹饷权力日益膨胀的社会历史背景下产生的。在《“厘金”的弊害及税费改革》^⑤一文中他们列举了厘

① 丁名楠等著:《帝国主义侵华史》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② 徐鼎新:《1902年在上海举行的中英“商约”谈判》,《社会科学》1983年第11期。

③ 周育民:《晚清厘金、子口税与加税免厘》,《上海历史学会1987年年会论文集》。

④ 《清末财政状况恶化对社会的影响》,《中国财经报》1999年6月11日。

⑤ 《“厘金”的弊害及税费改革》,《中国财经报》1999年6月18日。

金的弊害及对费税改革的几点启示。总体来说,除了“税”与“费”的视角之外,似乎没有太大的突破。其实,清政府对厘金的改革也是试图向着“税”的路径发展,“裁厘统捐”就是要将厘金演变为出产税和销场税。

四、本书讨论的主要问题

在以往学术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本书将试图从一个新的视角来讨论厘金及与之相关的问题。

第一,通过对前现代中国社会的国家财政投向、民间资本状况与走向及其原因的考察,透视出当晚清早期现代化启动时,资本原始积累严重不足。

第二,厘金虽然是因应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临时筹饷举措,但旋即是作为中国早期现代化的洋务运动的大力举办,无论是在中央财政投向还是在地方政府支出,厘金都参与了早期现代化的建设,成为资本原始积累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这一意义而言,厘金的产生有其一定的必然性和合理性。本书将厘金纳入早期现代化的资本原始积累的范畴之中探讨。以往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对厘金弊害的揭露与抨击,没有从厘金于资本原始积累的积极功用上做深入研究。

第三,厘金的诸多弊害引起中外的普遍烦言并提出了各种应对之方。先有“裁厘加税”,继有“裁厘统捐”、“裁厘征印(印花税)”、“裁厘认捐”,四者出现的背景、联系及未能实现的原因。鉴于厘金在晚清财政收入中的不可或缺的重要地位(约占整个财政收入的1/5),厘金成为晚清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的一柄犀利的“双刃剑”,使清政府在厘金的裁与留之间处于二难境地。尤其是甲午战败以后,巨额赔款使清政府财政极端艰难,庚子赔款更是雪上加霜,厘金已不可能轻言裁撤,而只能采取转换与抵补的方式,增加关税、开征印花税、统捐、认捐等等都是如此。在裁厘问题上,不仅是清政府,即使同意加税的